

顾炎武的史学观

■季蒙 程汉

顾炎武《日知录》说：“唐穆宗长庆三年二月，谏议大夫殷侗言：‘司马迁、班固、范曄三史为书，劝善惩恶，亚于六经。比来史学废绝，至有身处班列，而朝廷旧章莫能知者。’于是立三史科及三传科。《通典·举人条例》：‘其史书，《史记》为一史，《汉书》为一史，《后汉书》并刘昭所注志为一史，《三国志》为一史，《晋书》为一史，李延寿《南史》为一史，《北史》为一史。习《南史》者，兼通宋、齐志，习《北史》者，通后魏、隋书志。自宋以后，史书烦碎冗长，请但问政理成败所因，及其人物损益关于当代者，其余一切不问。国朝自高祖以下及睿宗《实录》并《贞观政要》共为一史。’今史学废绝，又甚唐时。若能依此法举之，十年之间，可得通达政体之士，未必无益于国家也。”

《日知录》素称学问巨著，但却不是为学术而学术，乃是关乎实事的。顾炎武认为，史书（司马迁、班固等）是劝善惩恶的，仅次于六经。这说明什么呢？这表现了古人的传统认识。一个，历史是善恶的总集，不仅是对前代善恶的汇总（账本），而且是对后人的善恶的告示。像春秋就是劝善罚恶的。另外就是中国的经-史传统，所谓思想与史实的固定关系，经当然是宣布思想的，比如说儒家经典，就是儒家思想的表达；而史实就是历史的、过去的事实，只有合乎事实的才是真思想，不是伪思想，经-史的传统固定关系就是这样。

其实，对历史荒疏、不了解，也不就是今人的问题，此种现象古代也不少见。比如，身处庙堂之上的大臣，也有不熟悉旧章往事的，因此就会有问题。所谓温故知新，如果说对本朝掌故都缺乏应该的了解，那么在政策上就会有失误，因为没有坐标参照系。晓得

过去才能开出未来，知道怎么做，这是古今的规律，谁也不能例外。所以史学就是实学，是政治家的第一学问，而不是故事、闲书，也不仅仅是经验、教训的总结。因此顾炎武触到的问题，所关非小。也就是说，史学的废绝，意味着政治学的荒疏，那么立政与行政都会有问题。虽然历史中史学一门曾专门立学，但并不是每朝、各代都有很好的维系和继续。

关于史书，我们知道以中国为最，这是世界公认的。无论二十四史、《资治通鉴》，还是历代纪事本末，等等，门类纷杂，层出不穷，给人浩如烟海之感而莫知其要，以至于人们有言，一部廿四史不知从何说起？这就是老子讲的多则惑，虽欲以史为鉴，然皓首穷经未必能言，这是主要的问题，顾炎武也谈到了。尤其是宋以后，史著更见繁杂，不仅部头大，而且门类多，于是只好是，与政治和当代有关的才提，此外就不谈了。顾炎武认为，史学，或者说历史知识，关乎国家政体得失，绝不是小事。只有通晓历史，才能通达国家政体，否则历史沿革不明，会导致颠预政治。这与司马迁讲的通古今之变是一样的。

我们只要回顾一下历史中学者、思想家们的史观，就能够理出一个大致的轮廓和规律。比如说，孔子是言必称三代的，因为孔子是周朝人，身处人类历史的早期和初期，后来的历史他无缘得见，当然话语所及便不出三代了，这是客观使然，并不意味着后来的

学人就要亦步亦趋，效法古人以自限。所以说，过去的人们只知道尊古圣贤，而遗落了此一常识，这是历史人文中的问题，显然不当，当然不对，而且贻害久远。像顾炎武说的，历史中又是这史、又是那史，搞得人们无法通盘了解，只好择定一门，单项某一块，看上去好像很协调，乃权宜办法，实际上都切碎了、搞散了。这就说明，历史中的古人，对于历史全体缺乏统体把握，没有得到要领。

其实，我们现在来看就很清楚，不要说中国史，就是人类史，只要抓住了要点，也是很简约的，无非三块——陆地、海洋、天空。陆上以两大帝国为代表——蒙古汗国、中华帝国；海上当然是殖民帝国，也就是英格兰为代表。它催生了一批新国家，如美国等。所谓天空，是指未来人类当致力于开发者。上古世界主要是三大——埃及、先秦、希腊。我们只要把握了历史中的八大帝国——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中华帝国、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蒙古帝国、奥斯曼帝国、英帝国，就能提纲挈领、纲举目张。人类史大坐标一定立，任何情节都不会迷失，很快就能找到其定位。所以完全可以说，一部人类全史，是可以要言不烦的，一目了然。古人之所以不得要领，也是因为身处局中，不识庐山罢了。经过了近现代，我们今天来看就很清楚，这并不奇怪。就像古人不知道新大陆，现代人却都晓得地球全图，这是一样的。

由此，我们再来看顾炎武讲

到的诸史，是不是就很明朗了呢？其实中国史无非三块——邦国时代、帝国时代、民国时代。顾炎武所谈的，主要是帝国时代，就是从秦到清。所谓中华帝国两千年史，就是指的这个。中华帝国历时二千一百多年，总体来说是地球上最长的帝国。其次是罗马帝国，大概一千四百多年，时间差不多长，幅员差不多大（中华帝国一千多万平方公里、罗马帝国五百多万平方公里）。所以八大帝国是比较、统计出来的，非捏造也。以人类八大帝国为主线索，就能很轻松、便捷地把握人类历史。所以，像顾炎武所担心的那种不得其要，现在来看已经不是问题了，虽然在当时是大问题。无论断代史，还是各种专门史，其实统一说来，都超不出三大史的范围，即人类史、文化史、思想史。人类史我们前面已经说了，人类文化史无非四大块——技术、艺术、制度、生活。像十通，就是制度全书；而宗教则属于生活范畴，人类生活。人类思想史无非三个要点——阴阳、神、空，这里不及展开。总之，我们握住了要领，就知道人类所有的学问、知识，其实是不出三大史的。在顾炎武那时候成问题的，在后世已经不是问题了。

《日知录》又曰：“宋孝宗淳熙十一年十月，太常博士倪思言：‘举人轻视史学。今之论史者独取汉、唐混一之事，三国、六朝、五代以为非盛世而耻谈之。然其进取之得失，守御之当否，筹策之疏密，区处兵民之方，形势成败之

迹，俾加讨论，有补国家。请谕春官，凡课试命题，杂出诸史，无所拘忌。考核之际，稍以论策为重，毋止以初场定去留。’从之。”

顾炎武谈史学问题，主要引唐、宋为例。像宋人，其实很多都是轻视史学的，别看有《资治通鉴》那样的大制作。而且人们论史，又自觉不自觉地取、抱一个得失的态度。以得失、成败论史，是功利主义的历史观。所以像什么雄汉盛唐，大家就高兴讲，六朝、五代那样的衰乱之世，人们都不爱去说，实际上这是很有害的。为什么呢？正如老子说的，善者吾师，不善吾资。对于不好的，说穿了，它们都是有益的反面教材，实际上更为深刻，规避这些，只会再过、二过。因此，顾炎武认为：讨究历史中的方法和办法，用好历史这个案例题库，只会有好处。而且科举考试也不应该回避历史，无论命题还是答卷，随时触及历史及问题，都应该是无所拘泥、不犯忌讳的。虽然顾炎武多引古人、前人之言语以表述之，但实际上却是表达、摆明他自己的态度。

《日知录》案，“史言‘薛昂为大司成，寡学术。士子有用《史记》西汉语，辄黜之。在哲宗时，尝请罢史学，哲宗斥为俗佞。’吁！何近世俗佞之多乎！”

薛昂依附蔡京，人品卑污，尝请罢史学，被斥为俗佞。顾炎武感叹：何近世俗佞之多？其实史学的俗佞极多，并不只限于人格卑污者，像二十世纪的疑古，也是一种俗佞史学。关于史学应该怎样去定位、理解，一直是人类的普遍问题。我们这里说的定位，当然是从终极的意义去讲。一言以蔽之，史学其实是最高的法学，也就是历史案例法及最终宣判。像孔子修《春秋》，就是要为后世立法（度）的意思。

我“认识”瞿秋白先生，是因为外公耿济之书橱里那两本深蓝色布面的《海上述林》和一枚刻着他姓名的小小印章。

记忆中，那两本《海上述林》很大很厚，比其他藏书高出足有半寸，估计总共有八百页左右，道林纸印刷，封面上烫着金色的“海上述林”四个大字和几个英文字母，虽然历经沧桑，但在外公的藏书中仍然引人注目。我问外婆，这是谁写的书，她说是外公的朋友瞿秋白先生的，那几个英文字母可能是他的笔名。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瞿秋白”这个名字。

后来书读得多了，才知道《海上述林》是鲁迅先生为纪念瞿秋白，发起编辑出版的瞿秋白译文集。那几个英文字母确是他的笔名，是鲁迅的笔迹。郑振铎先生和我外公是瞿秋白先生的好友，他们也参与了纪念活动的筹划。这两大卷译文集，我只翻过几次，还没来得及细读，就在十年“文革”中被“浩劫”了。

瞿秋白先生是外公在北平俄文专修馆求学时最要好的同学。“五四”运动前，他们常和郑振铎一起到北平米市大街的美国基督教青年会去找俄国文学书来读，受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果戈里等人的影响很深，



瞿秋白和外公在三年级时合作翻译出版了《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集》。瞿秋白先生后来回忆说，他们那时都是“托尔斯泰派的无政府主义者”。

瞿秋白先生孤身一人在北平上学，寄居在他堂兄家里，生活非常艰苦，常以两个烧饼就着白开水充饥。每天放学后，他到万宝盖胡同外公的家里一起复习功课。在外公的倡议下，他们在学校里完全用俄语交谈，谁忘记了，说了中文就要罚一个铜子。就这样，他俩迅速练成了一口纯正的俄语，翻译了大量的俄国文学作品，至今还被俄罗斯文学界誉为“两位最早也是最杰出的‘阅读俄罗斯’的中国人”。

“文革”初期，瞿秋白在八宝山的墓被砸，我外公在万国公墓

的墓地也被彻底摧毁……

一天，二姨把我叫到外婆卧室里，悄悄捧出一大盒外公的印章，要我想办法把印章上外公的名字磨掉，她非常害怕红卫兵来抄家。那盒里大约有十六七枚大大小小的印章，上面刻着“耿济之”（外公笔名）和“耿匡”（外公原名）。看着这些外公的遗物，我心里阵阵发痛，但有什么办法呢？印章用的石头似乎很珍贵，质地非常坚硬，我在三楼晒台的水泥地上使劲磨了好久，才磨掉了一颗，但还是留有外公名字的痕迹。于是，我拿了颗小的来磨，当我磨得差不多了，突然发现印章的正面刻有秀气的“秋白”二字，我一下震住了……这是瞿秋白先生刻赠外公的印章。一阵极其尖锐的钻心疼痛几乎使我无法自持。我找了块干净手帕，小心翼翼地把它包好，藏进了贴身的衣袋，下楼把那盒印章还给了二姨，说是太硬没法磨干净。二姨只好又把它们藏了起来。

不久后的一天晚上，一大帮

瞿秋白刻赠耿济之的印章

■陈逸

上海交大附中高干子弟红卫兵找上门来，直冲二楼外婆的卧室……要不是弄堂里那些出身无产阶级的邻居挺身而出，保护了我们家，那盒印章肯定落在他们手里，成为外婆莫须有的罪名。不过，我知道，他们无论如何也搜不去瞿秋白先生刻赠外公的那枚印章，我早已把它埋藏在前院一个

角落里了……

“文革”结束那一年，我把它取了出来，交还给外婆。外婆两眼一红，眼泪潸然而下，又把那颗印章交在我的手上，嘱咐我好好保存下去。

而今每每看到这颗外表并不出奇的小印章，总会思念起那些往事，感叹不已。

《大外交家周恩来》(全六卷)



李连庆 著 定价:580元

人民出版社 2016年12月出版

本书共六卷，描写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周恩来同志各个历史阶段的主要方面，分“执掌外交部”、“舌战日内瓦”、“万隆会议展雄才”、“鹏程万里行”、“行程十万八千里”、“光辉映晚霞”等，为全国人民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也为当代和后人研究周恩来的外交思想和伟大的人格提供了一份永载党和国家史册的珍贵材料。

发行业务电话：010-65257256 65136418 邮购地址：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100706）邮购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网址：
www.peoplepress.net